

现代社会科学文库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Modernisierung,
Wohlfahrtsentwicklung
und Transformation



〔德〕沃尔夫冈·查普夫 著
Wolfgang Zapf

陆宏成 陈 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代社会学文库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德] 沃尔夫冈·查普夫 著

陆宏成 陈 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Wolfgang Zapf
Modernisierung, Wohlfahrtsentwicklung und Transformation
Ed. Sigma, 1994

本书根据西格玛出版社 1994 年德文版译出

现代社会学文库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著 者：沃尔夫冈·查普夫
译 者：陆宏成 陈 黎
责任编辑：刘立群 程晓燕
责任校对：丁新丽 张景秋
封面设计：缪 萌
责任印制：窦建中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 刷：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5.25
字 数：127 千字
版 次：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98—114 号
ISBN 7—80149—003—7/C·003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德) 查普夫著; 陆宏成, 陈黎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7

(现代社会学文库)

ISBN 7-80149-003-7

I. 现… II. ①查… ②陆… ③陈… III. 现代化-德国-研究 IV.
D7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1939 号

总 序

承蒙出版社之邀，为《现代社会学文库》作序，本人自觉才疏学浅，深感惶恐。

今年是戊戌变法百年纪念，也是北京大学百年纪念，中国早期现代化肇始的许多制度化标志都发生在百年之前的 1898 年前后，中国的社会学亦然。1895 年严复发表了《原强》，把西方的社会学思想融合为他自己的群学思想；1897 年严复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1873 年著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一书译成中文，冠名为《群学肄言》；1895 年前后，根据梁启超的记载，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设立了群学的课程。如果以这些事情作为社会学在中国产生的标志，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就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若以 1910 年京师大学堂（1912 年改为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化的标志，那也已经有 88 年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实际上是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社会学导入中国的过程，与现代的器物、制度、思想和文化导入中国的过程是同步的，可它一经导入和产生，就完全被纳入中国的文化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而作为新思想的种子，它也在改变着这一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

社会学导入中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或一种方法，也是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就像与其同期导入中国的学堂、船政、邮电、铁路、银行、矿务等等制度形式一样，都是早期现代化的制度符号。社会学的导入中国，使中国学者对于社会现象的

研究跳出了一般性现象分类和大一统混沌解释的方法羁绊，走上了从具体现象的归纳出发寻求背后的因果规则的实证道路。

梁启超在他 1923 年演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中国学术开始转向务实的思潮追溯的更远。他认为近三百年“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的时代学术思潮，是对过去六百年道学传统的反动。蒋方震更把“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概括为堪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清学之精神”（《清代学术概论》序）。无论走向实证的学术取向乃中国所固有还是西学之东渐，中国广泛开始按一定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却的确是在社会学导入中国以后的气象，并非中国传统治学文化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学者那时才幡然省悟，原来在楼阁里谈论的学问，也是需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来检验的。

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结构，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它的变迁是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它是由无数的、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又实际上变动不居的日常社会行动构成的。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只不过有时缓慢得让人感到死气沉沉，有时又加速得让人感到变幻如云、不知所措。社会学所研究的、所关注的、所要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关于这种日常生活基层结构的变化规则的知识。这种知识除了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分析综合之外，别无他途。

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并不只限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一方法也同样有效。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F. 布罗代尔（1902~1985）在研究 15~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就特别注重从最基层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变化入手，他不厌其烦地从各种琐碎的关于衣食住行的资料中去发掘那些人们所不经意的东西，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这样撰写历史当然不如研究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

传统历史方法简洁，甚至让人觉得把轰轰烈烈的历史写得那么平常乏味、那么枯燥繁琐，但这样撰写的历史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是史学大国，但对中国的历史，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正史（“二十四史”）和编年史（《资治通鉴》等），而不是各种历史档案本身。对中国的“二十四史”，史学家历来关注的也是本纪、帝纪、列传、世家以及王朝更迭等重大事件。近现代治史的学者，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考古发掘的和历史遗留的实物，注重引证和依据第一手资料，也更注意研究史书中反映日常生活的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礼仪志、乐志、艺文志、职官志、舆服志、选举志等等。

20 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所推动的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以及外辱内忧之下学者所形成的富国强国的强烈使命感，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传统，推动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基层。但是，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具体和走向个别的惯性和偏好，也容易形成两个学术上的弊端：一是对理论的轻视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论上的匮乏；二是在研究中国或研究中国的某个地区、某个村落时，过分地强调其文化价值的“特殊性”，而与现代性的普遍性断裂。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中断约 30 年后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起飞和社会加速转型的现实，对社会学的研究形成强烈的刺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参与了很多现实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在理论上有了分量的建树，仍告阙如。

中国社会学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性的进展，必须以人类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的知识财富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学界共同的知识积累过程，系统而全面地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的各种趋势，把握住国际上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要善于理

解和辨析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观察社会现实的视角和方法，无论这种理论学派是实证的抑或解释的，是结构决定论抑或理性选择论。因此，及时地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著作，特别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成为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上的成熟和参与国际学术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很可能会使社会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对社会学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学也应密切跟踪和了解这种新的变化趋势。

学习国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要与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那些紧迫问题结合起来。社会学作为一门介入生活、改良社会的应用学科，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它的发展就是始终与对进步和秩序问题的关注密切相联的。然而，每个国家的社会学，并不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具有学术上的特殊性，更不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在学术上实行排他主义。社会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命题和不同的思潮，其研究对象可以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跨度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但属于这个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则是相同的，使用的学术语言和学术概念是共同的。

中国社会学目前在理论上的苍白，固然与社会学在中国内地近30年的研究中断不无关系，但独坐寒窗者日少，短平快的研究日多；理论的反思少，观点的炒作多；长远的知识积累少，赶时髦的时兴之作多；欣赏别人成果者少，自以为是者多；……成就和功利目标发生如此转向，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大学里的莘莘学子，通过老师和学兄之口，一代又一代地传咏着王国维对苦涩的治学道路所给予的诗意般概括：“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可见做大学问，要具有“回头蓦见”的功夫，就非要有“独上高楼”的勇气和“终不悔”的决心才行。

但愿这套包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国外译著两个系列的社会学文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学走向更加成熟的见证，记录下中国社会学新一代学人努力建树理论命题和丰富学术积累的真实足迹。

李培林

1998年初夏于北京月坛

中文版前言

本论文集也许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令中国读者感兴趣。首先，本书收集了有关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创新和福利国家发展理论的论文，这些理论正是当前社会学界讨论的话题。其次，本书包含了大量的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信息，特别是有关联邦德国统一前后的变化情况。第三，书中探讨了向市场经济和充分民主制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现代化和转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多数民众的福利水平，即第四点。书中介绍了一系列经验性的方法，用以实际衡量这种福利水平的提高，即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主观舒适满意的增加。

作者并非亚洲问题专家，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尽管他多次访问过日本、韩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保持经常的联系。在本书的最后两篇文章中提到了“亚洲道路”，但它绝不是对西方发展的简单模仿。相反，亚洲经验，特别是中国经验可以证明，确实存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道路”，而且远不止一条。

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必须重视保持生态平衡，社会整合与团结，保持个人主义化与安全保障的平衡的基本条件。在此，社会科学可以作出一份重要的贡献，经验性的研究可以检验事实论断。理论上的争论可以创造观点的多样性，使各派意见充分展现。在此，我向中国读者致以衷心的祝愿，并向本书的翻译、编辑人员表示感谢。

沃尔夫冈·查普夫

1998年4月于柏林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沃尔夫冈·查普夫
社会变迁	1
关于社会创新	13
个人主义化与安全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一些看法	31
社会现代化模式中的社会政策	42
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	54
前民主德国地区的转型和社会学现代化理论	70
统一后德国社会和民主的一些材料	86
德国东部正在发生一场人口革命吗?	109
福利发展与现代化	117
社会发展的其他途径	128
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结构	140
译者后记	151

社会变迁

问题的提出

社会变迁，是社会学中一个最常用的基本概念。如果借助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即社会结构的概念，那么，就很容易定义社会变迁。社会结构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一种不易改变的相对稳定状态。这样，社会变迁即可称为：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化。社会变迁理论试图确定借以观察社会变迁的单元和层面：社会变迁的维度，如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以及能够改变原有制度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变迁力量。至此，上述内容还能符合我们的日常理解。我们在口语中经常说到结构转变、制度转变和价值转变，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正处于加速变迁的时期，传统的制度日益受到人们的怀疑。

如果我们要问，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如何衡量并解释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并预测社会变迁，那末就是学术问题了。从社会学的古典派开始（人们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哲学史），人们始终在争论制度和变迁的“本质”，制度先行还是变迁先行，讨论能否形成统一的社会理论以及是否有必要补充解释方法。这些基础问题至今未能研究明白，更谈不上解决了，它们总是在理论讨论的前沿爆发出来。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将当时的“社会物理学”（*Physique Social*）命名为“社会学”，他和以往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家一样，都认为社会全面发展到“实证的阶

段”，人们将借助进步的科学控制自我。孔德将这种发展中保持平衡的基本力量分别称为静力（制度）和动力（进步）：“在实证的政策中，制度和进步是同一原则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他古典学者明确表明将变迁或制度作为出发点，尽管他们在解释那些原则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卡尔·马克思的名言：“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力的增长是推动发展的力量，各个生产关系的制度只不过是一种过渡。维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套用了马克思的表达方式：“历史是英雄的坟墓”，这就是说，古往今来，改朝换代，每一个朝代都在一段时间内给社会留下制度的烙印，而在此之后不得不让位于其竞争者及其朝代。

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代表了另外一条理论路线。他认为，秩序是基本的社会事实，只有在具备特殊变迁力量时才可能出现变化。社会建立在团结的基本事实基础上，即在共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社会成员之间天然形成的同心一致。由于外部的干扰（比如人口增长）和内部的干扰（失范，标志团结之不完善性的一种尺度），现有的秩序陷于变迁的压力之下；通过分化形成了先进的、有劳动分工的社会。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秩序是由统治集团的那些组织机构及其合法性予以保障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可通过不同的“统治类型”加以分析说明。统治类型的变化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力量（理性化、传统化、天才人物）。韦伯不知是否能称之为普遍的发展趋势，但他最终还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将通向现代世界之路描述为所有生活领域持续进行的理性化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各派学说具有多重意义。也许与自然科学的情况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法彻底超越古人，而他们总是不断地成为现时的理论讨论（参见阿隆 *Aron*, 1971 年）的连接点。以秩序或变迁作为社会分析的出发点是否会更有成效，这

一论题重新出现在结构功能主义（如帕森斯 *Parsons*, 1969 年）和冲突理论（如达伦多夫 *Dahrendorf*, 1959 年）两派的辩论中。是什么造就了社会结构（道德共性、文化合法性、经济强制、政治权力），什么是变迁力量（阶级冲突、反对派、天才人物、生态挑战、工艺成就），这些因素即使在当今的各种理论中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

现在，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概念本身比古典学者的范畴更为抽象（制度/进步，生产关系/生产力，团结/分化，统治制度/理性化）。如何理解包括西方文化圈以外的简单社会，如何理解整体社会层次以下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秩序不断变化和社会变迁的过程，当现代社会学想要解决上述问题的时候，以下概念就进入了现代社会学：体制、组织机构、群体、互动。社会心理学、小群体研究、文化人类学使得社会学基本概念更加抽象，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变迁理论的普及化。

在近期一场重要的辩论中讨论的问题是，社会学是否可以要求拥有自己的对象领域和自己的规律性，或者，制度、结构、组织、群体原则上是否并非必须由个人行为重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之争）。简而言之，说的是这样一个论题，即，最终只有行动着的个人动机和计划能够作出决定，采取团结或回避的举动，承认合法性或者加以抵制。在这种观点中，社会变迁理论应构想为学习理论、效用理论或者动机理论。符号互动主义显示出，远远超越一个个体寿命的文化合法性本身是如何被行为所生产、流传和再实现的。反对派并不否认最终只有个人采取行动，而是怀疑这种观点是否能够解释这种社会现象，即由于多个行为者的相互作用而在原则上显现出突生进化的特性。由此想说明的是，不能仅从行为者的学习成果、效益估计、动机和情势定义，来推断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分配结构与行为的集合结果，尤其不能是那些没有倾向的、似是而非的结果。（参见施密特 *Schmid*, 1982

年)

人们无须赞同迪尔凯姆的观点,他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个体只是社会发展的晚期产物。人们也不必为了维护社会现象的独立性,包括社会变迁的独立性,而将社会排在优先于个人的位置上。但这场争论绝没有结束,在理论发展方面,目前社会学总体上处于各种学说并列存在、同时使用多种“语言”的状况。通过更彻底的计划措施消除这种学说林立状况,是难度很大的实验,能否在专门的社会学解释的层面上,比如在解释社会变迁的层面上取得成功,还需要人们耐心等待。

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论题

我们知道,目前看不到社会变迁的统一的理论,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归纳如此之多的单项结论。因此,我们借助主要论题组织下面的概论,这些论题一般分别有几种不同的解释观点。

关于**社会变迁的单元**的问题,再次把我们引向了定义问题和社会结构自身会发生变化的特性。“每次社会变迁应理解为统治集团领导层人员的变化。”(达伦多夫,1959年)这种冲突论式表达的含义是,统治地位的安排和占领应视为决定性的结构事实,因此,也应视为变迁的单位。这个简单的操作原则对实际衡量变迁有很大的帮助(人员变化容易观察),不足之处是容易错误地区分人员交换、地位变动和政府更迭,这种区分方法最好由速度和深度维度来加以补充。

“我们把一个社会制度结构中一次变迁定义为其规范文化的变迁。当我们观察社会制度的最高层次的话,就会涉及到整体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帕森斯,1969年)这种结构功能论式的说法只把规范和价值变化当作结构变化,而将持久的规范和价值范围内角色和关系的变化理解为适应;另外,在研究社会制度时,完全不考虑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中行为的人,这当然激起来自

方法论个人主义方面的批评。很明显，按照这种观点，法律、宪法、文化方面指导原则的变化显示出最深远的变迁过程，尽管没有明显的实施操作。

“变迁过程原则上可以理解为选择过程，它通过自身的综合结果和/或再生产过程资源需求，排除或择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施密特，1982年）这一复杂的表述表明了最近时期系统理论的诸多观点中的主要论题。社会系统必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证明自己，即，能够克服自己的行为后果并保障生存资源；社会系统必须改变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结构（排除某些行为方式），强化那些胜任此项工作的结构（择取某些行为方式），这种理论观点在以下方面考察所有可能的社会单位：自身的、超个人的行为后果，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在选择压力下的再生产需求。

针对**社会变迁层面**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处理。对于社会行为的微观层面、中观层面、群体、制度和组织以及整体社会的宏观层面的划分方法，存在普遍的认同。但是随着理论上出发点的不同，出现了有趣的排序问题。个人主义的观点是通过“资源组合”从个体到集体行为者直至相应的变迁过程。集体主义宏观社会学的理论观点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通过分化、专业化、分解从整体社会的变迁过程分析到中观层面、直至微观进程。对古典学者来说，最为主要的文明（即全人类）层面，对于当今的现代化理论、趋同理论以及世界社会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实际涉及的是民族国家社会的自治和彼此依存的问题。眼界放的越远，就能越来越多地发现跨国行动者和跨国变迁过程（跨国公司，防卫联盟，世界市场，大众文化等等）；但是，越细致地进行比较分析，就会越明确地感到，历史形成的体制具有强大的决定结构的力量，而这些体制在现代社会当中依然是在民族国家中被整合的。

我们想描述、衡量社会变迁的维度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这

些维度首先是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速度**是用纪年法的时间单位衡量的。但是，不仅应谈论历史的时间过程以及处于该时间过程中的个人的生活经历，而且还应论及机构、政权或文明的生命周期。曼海姆（*Mannheim*，1928年）在辈辈相传、新老交替中发现了社会变迁的一种决定性的机制，在新老交替中，老的知识可谓渐渐死去，新的知识按照塑造年轻一代的历史经验推广普及（加快、延缓）。在创新研究当中（参看艾尔斯 *Ayres*，1984年）这种思想被普遍化：变迁产生于弥散过程的集合，即创新的推广速度。在此过程中，推广和接受创新的机遇随参与的个体和集体行为者生命周期的不同而变化。

社会变迁的**深度**首先可以从所涉及的诸多单元变化的数量和比例来衡量（如，城市化、基础教育、选举权的扩大等过程）。其次可以根据涉及领域的规模（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等），而词义上是依据涉及层面的类别和数目，在此，社会结构总是被设想为层面和领域组成的等级系统。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些改变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才是决定性的。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等级系统（角色、集体、规范、价值），价值观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变迁过程；冲突理论的观点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不仅改变个人或组织，而且改变统治集团政府的变迁。最新的系统论的观点想借助一种社会系统及其变化的通用理论，克服以上的角度主义，为此使用了进化论的概念：变异、选择、再生产。（参看吉森 *Giesen*，1980年；卢曼 *Lumann*，1984年）按照这一理论，在永恒的变化中，有些选择能最大程度改善相关单位再生产的机遇，这些选择的特点决定了主要的变迁过程。假如是考察整体社会进化的话，那么这些选择过程即以下“成就”：如，法律、市场、民主立法统治、科学，他们作为“进化通则”被大多数社会所接受。（参看帕森斯，1969年）

革命可被描述为迅疾而深刻的（政治）社会变迁。在此过程